

拥抱与抗拒

——美国大众文化在魏玛共和国

陈从阳¹, 吴友法²

(1. 咸宁学院 人文学院, 湖北 咸宁 437000; 2.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从阳(1965-), 男, 湖北汉川人, 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德国近现代史和20世纪世界史研究; 吴友法(1948-),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德国史研究。

[摘要] 魏玛共和国时期, 特别是相对稳定时期, 美国大众文化迅速传遍德国, 赢得了以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 对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的忧虑和对德意志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 出现了德国社会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质疑、诘难。美国大众文化的风行加深了魏玛文化的混乱。

[关键词] 美国; 大众文化; 魏玛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51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68-07

探讨魏玛共和国时期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和反响, 不仅对研究魏玛共和国史和德国近现代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为我们如何应对外国强势文化的冲击提供了某些思考。

—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物质丰裕为美国建立在消费、娱乐基础上的大众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条件。美国大众文化对现代社会特有的吸引力、商业性、穿透力导致了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理查德·基塞指出: “至少从19世纪末期以来, 美国就一直出口某些产品、技术、时尚、投资和艺术形式, 还出口人员、制度和思想, 凡此种种均被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强烈地看作等同于美国。在这些出口品中, 许多可被宽泛地归类为大众文化或消费社会的特征。不管是大众文化, 还是消费文化, 都被美国人在全球规模上给予充分的发展或积极的转变。”^[1] (第511页) 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称20年代为“世界美国文化化”、“美国化的时代”^[2] (第104-106页)。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洞开了德国文化交往的大门。魏玛文化对外来文化表现了更大的包容性, 使其带有更强的世界性特征。共和国文化人从世界文化中汲取养料, 如布莱希特的戏剧受到中国京剧和奥古斯都时代的讽刺文体的影响^[3] (第7页)。赫尔曼·黑塞号称“迷恋中国文化的文学家”^[4] (第243页)。柏林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艺术家, 德国娱乐性行业的许多天才人物都来自国外。1925年, 乔治·贝克在给悉得尼·布鲁克斯所著的《美国和德国: 1918—1925》一书的序言中强调指出: 1918年后德国对美国的怨恨已经消退, 严肃的德国人开始向美国寻求友谊和帮助、甚至庇护^[5] (第179页)。

德国白领职员阶层发展和壮大, 成为大众文化积极的追逐者。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德国“白领阶

层”一直呈上升趋势。据1927年人口统计,白领雇员(不包括公务员)占受雇人口的比例为11.2%,1905-1925年,白领雇员(不包括公务员)人数增长了2倍多^[6](第187-188页)。白领雇员虽与产业无产者同属于受雇者,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产业工人不及的优越性,在白领职员身上体现了强烈现代化进程的痕迹。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这样评述白领职员:“他们的存在,无论在柏林、还是在其他大城市,逐渐地获得了统一的趋势。共同的职业和集体合同决定了其生存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同质的、大都市的公共群体”^[7](第327页)。克拉考尔将柏林看作是:“纯粹职员的文化,即由职员创造、为职员创造、被大多数职员所接受的一种文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美国的大众文化。德国文化批评家甚至提出了“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专有名词。在鲁道夫·凯泽尔看来:“美国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方式……是一种具体的、充满活力的方式,它是完全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现实性基础上的。”^[6](第395页)“美国主义”与美国关系如何,洛兰认为:“美国主义”最有用地被理解为将美国想象或构建为可以作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印象和话语”^[8](第6页)。不惟如此,“美国主义”实际上与“美国化”、现代性等也密切相联,波伊克尔特将20年代的“美国主义”视为不受限制的现代性的流行语,德国大众对“美国”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德国自身社会及现代性对其挑战的争论^[9](第178页)。

在20年代中期,柏林先锋派艺术家将美国大众文化视为实现德国文化、生活快速现代化、民主化的工具。德国先锋派希望德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快速现代化能够提供转变德国社会的能量和活力,从而提供一场替代政治革命的革命。德国许多知识分子热情拥抱美国大众文化和现代性,把美国文化视为民主与平等。20年代初期,在布莱希特和其他许多先锋派作家眼中,相对于半封建生活方式的德国而言,美国是惟一现代进步的替代物。1930年,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回忆道:“美国是一个好概念。美国是未来之域,美国是世纪家园。我们太年轻还不太了解它,但无论如何我们喜欢它。”^[7](第323页)。

美国的音乐、舞蹈、电影、大众体育等消费和娱乐文化在德国广受欢迎。各种舞姿竞相媲美:美舞(裸体舞)、查尔斯顿舞、狐步舞、探戈舞等风靡一时。1926年查尔斯顿舞成为德国最流行的舞蹈。甚至连美国歌舞女郎(Tiller Girls)动作齐整、机械精确的大腿舞也被视为美国式现代化生活享受和精神气质的表述。克拉考尔认为:“这些女孩是在美国人为制造出来,出口到欧洲……她们展示了美国制造的伟大……当她们呈现出一条波浪起伏的蛇形时,她们容光焕发地展示了传送带的品格;当她们以飞快的节奏敲击脚步时,听起来就像是做生意、做生意(的声音);当她们以数学般的精确高高地踢起她们的双腿时,她们在愉快地肯定合理化的进步性。”^[10](第179页)。德国人艾里克·卡勒尔、赫尔曼·哈勒、詹姆斯·克莱因等也发展起自己的时事讽刺剧(Revues)歌舞团,20年代中期,时事讽刺剧成为柏林最流行的现场娱乐形式,1926-1927年间,柏林提供了不下9场时事讽刺剧,观众达11000人^[6](第552页)。

20年代被称为美国爵士乐的黄金时代。《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德国与爵士乐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1925-1926年美国爵士管弦乐队山姆·伍德和保尔·怀特曼在德国巡回表演,美国爵士乐迅速传遍德国。黑人女歌星、舞蹈家贝克尔迅速征服柏林夜生活,成为爵士、查尔斯顿、无穷性感和新的充满活力的偶像。鲍豪斯艺术家甚至试图在爵士和高雅的现代性之间建立联结。1927年德国人创立的“和声喜剧演员”(Comedian Harmonists)爵士乐队深受美国爵士乐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美国的翻版。

自1924年开始,美国电影在德国市场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1922年德国电影公司曾达360家,在美国电影强大竞争下,德国独立电影厂纷纷倒闭,1925年甚至连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乌发(UFA)(宇宙电影股份公司)也不得不引进美国资本,与美国电影公司合作。与此同时,德国电影院迅速增加,战前为2000家,1920年为3700家,到1929年更达5000多家。通货膨胀爆发后,美国的喜剧片、动作片也不断引入德国,查理·卓别林、哈罗德·劳埃德、布斯特·基顿的喜剧片纷纷出现在德国市场上,受到德国大众的普遍喜爱。看电影成为德国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阿道夫·贝奈承认:“(美国)电影是……民主的……这已经被德国观众所承认,他们蜂拥着去看查理·卓别林影片。”^[11](第178页)汉斯·西蒙森特别熟悉卓别林的作品,1922年他在《世界舞台》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称赞卓别林是电影里的第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将其视为德国电影制片人的楷模^[11](第 178 页)。1921 年、1931 年卓别林两度访问柏林,后一次甚至得到了皇室般的礼遇。随着《淘金记》的放映,德国掀起了一股《淘金记》热。

1921——1929 年德国和美国在德国电影市场的份额^[12](第 54 页)

	故事片		短片		总计	
	德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德国	美国
1921	——	——	——	——	646	136
1922	——	——	——	——	474	202
1923	253	102	94	149	347	251
1924	220	186	51	155	271	341
1925	212	216	16	391	228	607
1926	185	216	4	337	189	553
1927	243	190	3	394	246	584
1928	224	199	8	422	232	621
1929	183	142	5	316	188	458

20 年代是美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的时期,网球、拳击、橄榄球等风行一时。在德国,20 年代是一个崇拜体育明星的时代。德国人喜爱体操、足球、网球等体育活动,星期天有上百万人涌往足球场,在大城市还进行汽车比赛和自行车赛等。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喜欢美国的拳击运动,画家兼雕刻家格罗斯茨、布莱希特及其朋友们都被美国拳击家们——从鲍博·菲茨西蒙斯到杰克·登普西——的英雄事迹迷住了。鲍尔·萨姆索-克尔纳是著名拳击家,布莱希特曾想写他的剧本,1930 年马克斯·施梅林在纽约成为第一个获得拳击重量级世界冠军的德国人^[12](第 33-34 页)。

美国现代生活方式还影响到德国人的时尚、风俗习惯、审美、品位、性行为、闲暇和娱乐等。举例来说:如当时的妇女时兴着短下摆的衣服、女子梳带流苏刘海的发型。20 年代时髦女子(Flapper Style)的形象颇为流行。爵士、买弄风骚、性吸引等出现在德语词汇,嚼口香糖成为“使自己美国化最廉价的方式”^[9](第 656 页)。听收音机、看电影等成为德国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1924 年收音机的用户为 10 万,1926 年达到 100 万,1928 年为 200 万,1932 年超过 400 万^[9](第 594 页)。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协议假期等新的工作和休闲方式开始出现。德国传统的稳健、内向的性格消失了,报纸的大标题“高速度”时有所见。20 年代是一个性急、马不停蹄的时期。

柏林是“美国化”的中心。大柏林人口 430 万(1930 年代初),规模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是世界第三大城市,号称“欧洲的娱乐城”。20 年代柏林舞蹈风靡一时,最能代表柏林风格的是查尔斯顿的美国舞,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事事讽刺剧的轻歌剧。阳台、阶梯大歌剧院歌舞升平。产生于帝国时期的“卡巴莱”的讽刺短剧颇为红火,先锋派和群众性文化的重要人物咸集于咖啡馆(如罗马咖啡馆、燕尼克咖啡馆等)，“咖啡馆文化”独具特色。柏林一年一度的自行车 6 日赛车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强身健体成为时尚。柏林生机勃勃,成为机会的代名词。格奥尔格·格罗斯茨在回忆录中将柏林比喻为沸腾的锅。

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还渗透到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共和国早期的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的文化批判逐渐被取代,20 年代中期新客观主义(新写实主义)成为潮流,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电影等不断增加,《大都会》、《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等反映城市生活的电影产生了很大反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断涌现。知名记者艾贡·埃尔文·基希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发展了报告文学的艺术形式。1928 年至 1929 年基希曾秘密访问美国,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王党美国》^[13](第 318-310 页)。追求突破“纯粹艺术”与实

用艺术对立、在建筑和设计领域内发展出新的“综合艺术”的鲍豪斯学派人才济济。

二

与德国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与技术、合理化结合起来,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集中化、同一化,出现了艺术品位降低、粗俗化、庸俗化的倾向。本雅明在《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指出:在机器再生产和复制的时代,原件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文化的艺术质量与其市场价值发生了冲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淫荡、下流、青年犯罪、两性关系问题等成为工业城市群众民主生活的严重问题。柏林在获得“欧洲最大的娱乐城市”的同时,也获得了“最腐败城市”的称号。跳舞狂潮蔓延、性道德滑落、性关系松弛;裸体舞、脱衣剧和淫书淫画、格调低下的“性文学”泛滥充盈;电影、文学、流行音乐热衷于风流韵事、罗曼蒂克式的爱情、婚姻关系的破裂和“试婚”;性浪潮此起彼伏,妓女高居文学和电影的主角。与此同时,性病泛滥成灾、毒品生意兴隆、青年犯罪大幅上升,整个社会浸透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气氛。

与战前强大、“正派”而道德的威廉帝国相比,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对共和国道德的滑坡无不痛心疾首,斯蒂芬·茨威格甚至认为柏林比苏托尼厄斯(公元75—160年)时堕落的罗马有过之而无不及^[11](第107页)。1927年,因几个男女中学生群居嫉妒而导致两个学生自杀的克朗茨诉讼案更是闹得沸反盈天,整个社会充满了对自由、对共和国的责难。1929年,知名的文化史家施泰因豪森发表《德国文化史》(第三版)。在他的眼里,当时的文化发展是一片黑暗。他认为,新的技术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唯物主义文明导致了文化总没落;大众精神的新时代,为活跃而活跃的新时代,从根本上说,是反文化的,是要让人们的心灵之花枯萎^[12](第36页)。1933年3月,新闻记者弗里德里希·胡桑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一书中仍然难平他对共和国领导人和魏玛文化的不满:“他们声称他们代表德国精神、德国文化、德国的现在和将来……他们的商品得到推荐,不管它是乳酪还是相对论。是脂粉还是时代剧,是专利药品还是人权,是民主还是布尔什维主义、是流产宣传还是反对合法体制,是败坏的黑人音乐还是裸体舞。简而言之,从来没有过一种专政比‘民主精神性’专政和文明文学家专政更无耻。”^[13](第80-81页)

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德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一直冲突不断,对现代性的批评,始终是德国思想发展中的基本潮流。魏玛共和国号称“现代性的摇篮”,以德国的方式展示了现代性的普遍危机。技术的飞速进步、合理化的普遍采用、大众社会的降临、大众消费和娱乐文化等的兴盛,伴随着市民文化和传统学者精英文化阶级的衰落,这些都增加了老中间阶级对现代性的抵御与对大众文化和人性的担心。

1924年,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小说《魔山》中对合理化、理性在危机时代是否有足够能力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表示怀疑。曾经大力主张大众文化是大众民主和技术进步的逻辑延伸的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1929年批评道:文化上的美国主义是用娱乐分散“无家可归”的白领群众注意力的流行作法,而不是去启发他们了解受剥削的地位。2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作为社会控制强有力的手段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7](第328-329页)。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现代性、大众文化下人性的压抑和自我的可能丧失,相当多的文化人陷入了迷茫。在《荒原狼》主人公哈勒看来:现在整整一代人挤压在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人类没有能力了解自身,没有标准、没有安全、没有简单的默许……。1931年,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作为现时代的人》中写道:“毫无疑问,存在着广泛的信念,即人类的活动是徒劳的;任何事物都变得可疑;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持续有效;存在仅仅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大漩涡,依靠思想意识去不断的相互欺骗和自欺。”^[14](第86页)1931年,左翼文学家埃里希·克斯特勒更表现出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我们正在死亡,因为我们所有方面的精神已经停止了。我们希望事物改变,但我们并不想改变我们自己……血液已经被毒化……而我们满足于在地球表面每一个创口表面敷上一层药膏,你能用这种方法治疗被毒

化了的血液吗?你不能。病人终有一天要崩溃,带着从头到脚的药膏。”^[13](第484页)在普遍的迷茫中,弥散着一股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的情绪。克劳斯·曼写道:“我们处在视任何事物为可能的特殊地位,……下星期我们拥有一位君主和一位皇帝吗?我们对这一点也不感到震惊。……我们为任何事物准备着。”^[15](第477页)这种躁动不安而又无力回天的心理状态,为像希特勒这样的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家进行欺骗宣传,虏获大批对现实不满的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产阶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三

在德国历史上,文化是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基础,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被视为“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战争的失败,德国政治扩张主义受到扼制,德国民族自尊心遭受重创。面对共和国、议会民主,德国许多人感到茫然,认为是外国的舶来品,“西方文明”与“德意志文化”格格不入。

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评不绝于耳。克拉考尔认为:美国歌舞女郎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所向往的合理性在美学上的反映,是“大众装饰物”^[14](第404-407页)。文化批评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则尖锐指出:“这些舞女的表演和做作中,不仅有着一种色情的魅力,而且还有一种军国主义的魔力。”^[19](第180页)在保守主义文化批评家看来,爵士乐太快、太机械、太原始、太无文化、没有灵魂,是“丛林音乐”。爵士还与异域文化、特别是色情、道德堕落联系起来。好莱坞的电影受到更多责难。1925年,乌发与美国两家电影公司组成合资公司一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合资公司象征的不是“洛迦诺”而是“凡尔赛”,是将一种电影文化价值观和方法强加给另一方^[11](第80页)。文化保守主义者阿道夫·哈菲尔德将德国美国化主要归因于好莱坞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和向德国进行的文化入侵,而不是美国直接的政治、经济影响。德国观众对美国电影传播的美国伦理、道德观也很反感。1926年《贪婪》电影首映式在德国甚至引起骚动,结果该片未能公演。对美国文化的普遍恐慌感不仅存在于保守主义的文化批评家如阿道夫·哈菲尔德、斯本格勒,甚至在左翼先锋派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福伊希特万格等中间也广为流传,他们担心持续不断的美国化、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将使德国丧失文化本体,吞噬德国文化个性。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美国文化的影响将会导致技术专政,最后导致全面毁灭。

德国学者试图揭示美国文化、美国主义的特点和本质,认识美国主义的局限。在鲁道夫·凯泽尔看来:美国主义和美国文化是一种新类型的文化,它没有历史包袱;具体;不带感情色彩;年轻、充满野性,但缺乏教养和任性;美国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敌人,它立足于现实,讲求实用主义,充满活力;美国文化直接与自然和身体联系在一起^[6](第392、395-397页)。阿道夫·哈菲尔德认为,追求成功是美国主义的最高理想,在美国“商业理想主义”那里,上帝、挣钱、资产阶级道德三位一体^[6](第407页)。奥托·鲍威尔则探讨了合理化的本质,批评了太多合理化、过速合理化造成的合理化幻象,指出合理化危机将导致民族主义和反民主浪潮的席卷^[6](第410-411页)。

对美国主义、美国化在德国的发展前景,德国学者普遍持审慎态度。费里克·施丢希认为,德国需要正确的美国主义,将创造美国伟大成就的基础以及由这些成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引进到德国和欧洲去^[6](第408-410页)。阿道夫·哈菲尔德则认为,美国主义只能种植在民族的土壤里,大众文明只能在美国那里发展得更纯粹。对欧洲大陆高度复杂的精神灵魂,开具新的超个体客观主义的万灵药方过于匆忙^[6](第407-408页)。保守的、反现代主义阵营的文学家戈特弗里德·本恩则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主义:“自1918年以来,几乎整个德国文学都是在‘节奏’、‘爵士’、‘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的口号下经营的,而与此同时,所有关于心智和情感的问题都直截了当地摈弃了,……我自己是坚决反对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哲学、那种所谓的乐观主义、那种永恒的裂着嘴的‘微笑’,都是与西方国家的人们和它的历史不相适合的。”^[19](第185页)。

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进行了抵制。德国文化

保守主义者网罗了德国政治上各个派别, 其中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社会职业来看,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间阶级影响较大。他们对美国化、美国主义、现代性的挑战深为不安, 但与文化悲观主义者不同, 他们对德国青年、德国文化遗产充满了信心, 希望利用德国文化资本来定义时代精神, 用德国文化对抗西方文明和美国主义, 通过复兴德国文化, 走向祖国复兴的道路。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寻找和培育优秀“伟大艺术”。他们特别强调“经典”、“旧的艺术大师”(包括古希腊经典); 鼓励“民间文化”的发展, 并试图改进大众文化, 使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高雅”起来; 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 多数人持中间路线, 他们反对过于现代化和现代性, 但对于建筑艺术上的现代性持较妥协和开放的态度, 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提出了德国式现代性的追求目标; 他们竭力抵制文化女权主义的挑战, 捍卫德国男性为主导的文化; 他们还极力推动国家采取积极的文化干预政策, 1926年通过了保护青年法令^[16](第248-316页)。

魏玛共和国对“美国主义”、“美国化”等作出的反应, 反映了德国这个一战后快速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国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正负效应、对如何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作出的探索和思考。魏玛共和国社会内部对美国文明和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 使影响共和国高度破碎社会结构形成的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地域分布、民族差异等诸因素中, 又增加了对待外来文化和文明态度这个不定的因素。共和国虽然给予了广大知识分子充分的自由权利, 但知识分子对共和国并不满意, 从总体上看, 共和国并没有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平森对德国文化上的纷杂混乱状况与共和国覆亡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经济危机、政治上的紧张状态以及文化方面的混乱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汇聚在一起, 造成了一种似乎是毫无出路局面。正是这样一种危机感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覆灭提供了气候条件。”^[17](第619页)

[参 考 文 献]

- [1] Kuisel, chard. Americanization for Historians[J]. Diplomatic History, 2000, (3).
- [2] [美] 孔华润(沃伦·I. 科恩).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下[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 [3] Gay, Peter.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 [4] 马树德, [德] 顾 彬. 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德国卷[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5] Barclay, David E. & Elisabeth. Glaser-Schmidt. Transatlantic Images and Perceptions: Germany and America since 1776[C]. Washington, D. C. and Cambridg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6] Kaes, Anton & Martin Jay Edward. Dimendberg.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C].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7] Trommler, Frank & Joseph. Mcveigh. America and the Germans: an Assessment of a Three-Hundred-Year History: Volume Two[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
- [8] Fehrenbach, Heide & Uta G. Polger. Transactions, Transgressions, Transformations: American 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C].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0.
- [9] Peukert, Detlev J. K.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M].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1.
- [10] Costigliola, Frank. Awkward Dom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urope, 1919-1933[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1] Saunders, Thomas J. Hollywood in Berlin: American Cinema and Weimar Germany[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12] Laqueur, Walter. Weimar: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M].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 [13] 李伯杰. 德国文化史[M].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 [14] Martel, Gordon. Modern Germany Reconsidered, 1870-1945[C].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15] Cralg, Gordon A. Germany 1866-1945[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16] Seldern, Adalbold Vo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Germa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890-1960[C]. Ann

Arboi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17] [美] 科佩尔·S. 平森. 德国近现代史: 它的历史和文化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责任编辑 桂 莉)

Embrace and Resistance

CHEN Congyang¹, WU Youfa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ning College, Xianning 437000,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CHEN Congyang (1965-), male, Doctor, Professor, Xianning College, majoring in Germa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WU Youfa (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erman History.

Abstract: In Weimar Republic history,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latively stable stage, American mass culture was spread widely in Germany and was warmly welcome by the new 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white-collar worker. At the same time, the anxiety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mass culture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fate of german national culture accompanied the doubt about the mass culture and the charge of it. The fad of America mass culture deepened the chaoses of weimar society.

Key words: America; mass culture; Weimar Republic; reflection